



“一带一路” 学术参考

2018年 第2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

目 录

2018年第2期(总第2期)

资讯焦点

大数据里看变化: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成效显著	1
“一带一路”将成为能源合作新亮点	4
首届“一带一路”上海论坛在沪举行	
“一带一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7
推动上合组织深化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带来新模式	9
中国对外投资连续7个月增长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成亮点	10
《“一带一路”5周年调查报告》:超9成受访央行	
预计“一带一路”倡议将带动经济增长	12

深度透视

李向阳:用正确义利观指导“一带一路”建设	13
李永全:“一带一路”为上合组织注入新动能	13
陈甬军:“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开放的理论分析	15
傅梦孜:“一带一路”五年历程波澜壮阔	17

交流与成果

交流合作

我校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

高级研讨会 周汉民教授作主旨报告	19
------------------	----

学者成果	25
------	----

学术前沿

智库报告	28
经贸金融	29
政治法律	33

海外视点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Radar	36
Mexican ‘Silk Road’ Trade Corridor is Set to Spice up US Tension	39

他山之石

Energy Investment Risk Assessment for Nations Alo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43
Does Finance Affec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Evidence from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Region	44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reliminary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45

资讯焦点

1、大数据里看变化：“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成效显著

【全文】去年5月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论坛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清单并得到有序推进，“一带一路”相关领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年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化，我国贸易增速以高于整体外贸增速的势头推动外贸加速回暖，不仅成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大亮点，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国际班列”进一步汇聚动能，在政策对接、产能合作、金融服务、人文交流等领域的互动协作不断深化，“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出发，中国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太经合组织岷港会议、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国际舞台上得到广泛认同，“一带一路”倡议正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5月16日，国家发改委举行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发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就重点领域改革、对外开放、降成本以及多项建设规划等热点问题回答提问。

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需求，为相关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之所以将“一带一路”建设称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沉甸甸的数据是最好的佐证。

从去年5月14日至今，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过周年。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孟玮表示，论坛落地的成果可以用5个方面的数据来说明。

一是政策和规划对接不断强化。中国已与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3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去年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共形成了279项成果清单，目前已经有255项转为常态化工作，有24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二是雅万高铁、瓜达尔港、中俄原油管道复线等一批重大项目取得早期收获，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有序推进。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8000列，通达欧洲14个国家和42个城市。

三是贸易与产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270多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

四是金融服务领域合作得到加强。丝路基金已签约19个项目，承诺投资70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金额达到800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各商业银行支



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五是人文交流逐步扩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倡议同60多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一带一路”框架下,双向旅游交流的规模超过了2500万人次。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带来更多的合作共赢。

贸易成绩单可圈可点

5月6日,由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共同编写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正式发布。据悉,这是第二次发布“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据“一带一路”外贸大数据研究所所长、瀚闻资讯董事长童友俊介绍,报告涵盖了71个“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内地的31个省区市,综合运用了数据挖掘、聚类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分析方法,调用的基础贸易产品种类和数据量达8500多种、2.7亿条,对“一带一路”贸易总体格局、合作现状及发展态势作了全面系统地分析。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由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共同编写。这份报告以反映“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现状和趋势预测为核心,在延续去年报告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力图更加清晰、全面、深入地展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区域合作、国内各省区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一带一路”贸易商品结构等方面的最新特征与趋势。该报告凸显三大特色:一是广覆盖,包括71个“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韩国、巴拿马、南非、新西兰、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首次被纳入统计范畴;二是大数据,报告综合运用了数据挖掘、聚类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多种大数据分析技术,调用的基础贸易产品种类和数据量大幅增加,达到8500多个种类、2.7亿条,并以附录的形式完整展现各类基础数据以便查询;三是多维度,报告从双边贸易额、贸易商品、贸易主体、贸易方式、合作模式等多个维度,全面、客观分析了2017年“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总体格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各省区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现状和发展态势。

该报告内容丰富、数据详实、图文并茂、亮点纷呈。报告显示:

1、从总体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进口增速首超出口。

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4403.2亿美元,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5.9个百分点,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一带一路”国家重要性愈发凸显。其中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7742.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4.1%;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66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占中国总进口额的39.0%,近五年来进口额增速首次超过出口。

2、从国别区域看:亚洲大洋洲地区与中国贸易额比重占五成以上,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额增速最快,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是中国主要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伙伴。

2017年,亚洲大洋洲地区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第一大贸易合作区域,进出口总额达8178.6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56.8%。从区域贸易额增速看,2017年,中国对中亚地区贸易额增速最快,较2016年增长19.8%,其次是东欧(17.8%)。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中国与这10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的68.9%。进出口总额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为卡塔尔、黑山、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其增速均在35%以上。

3、从国内地区看:东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占比近80%,东北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分列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前

五名。

2017年,东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11494.1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79.8%。从区域整体看,东北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增速最快,较2016年增长22.0%,其次为西部地区(15.6%)。从具体省份来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排名前五,贸易额比重合计达67.8%,其中山东首次进入前五。

4、从商品结构看:机电类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电机电气设备和矿物燃料类是我自“一带一路”国家最主要的进口商品。

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商品主要集中于机电类(含电机电器设备和锅炉机器等),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23.2%、15%,其中,电机电气设备出口额增速明显较2016年增长15.8%。而中国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商品主要集中于电机电气设备和矿物燃料,占中国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26.7%、23.6%,其中矿物燃料进口额增速较2016年增长34.1%。

5、从贸易主体看:民营企业成主力军,国有企业增幅显著。

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占比最大,2017年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的43.0%,其次为外商投资企业(36.6%)、国有企业(19.4%)、其他企业(1.0%)。而国有企业进出口总额增速最快,2017年国有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为2795.9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24.5%,其次为民营企业(12.1%)、外商投资企业(10.2%)、其他企业(1.2%)。

6、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近6成,一般贸易与边境小额贸易进口增幅显著

2017年,一般贸易进出口8407.6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的58.4%,从增速看,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增速最快,2017年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79.5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7.3%,其次为一般贸易(16.1%)。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在进口增速方面表现突出,分别同比增长28.7%和27.7%。

有声音认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前期信息和运作不够透明。“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已有不少西方跨国公司参与其中。”发言人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始终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市场化运作,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共建。

发言人强调,“一带一路”共建的项目主要是商业项目,是企业的市场行为,采取何种运作模式、如何公布项目前期信息,是由项目业主单位来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政府,但是政府会建议企业尽可能公布项目前期信息,同时,也会向社会及时公布所获知的有关项目信息。

“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发言人说,共建“一带一路”的市场很大,足以容得下各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其中,共同把蛋糕做得更大,使全世界人民共同受益。

附件列表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在线阅读版\(电子书的入口\)](#)

http://www.sic.gov.cn/News/553/9207.htm。

【来源】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国家信息中心 2018-05-21

2、“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发布联合倡议

【全文】“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16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闭幕，与会者就税收法治、纳税服务和争端解决等议题深入讨论并联合发布了《阿斯塔纳“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倡议》。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越深入，加强税收合作越重要。此次会议开创了新的对话平台、探索了新的合作框架，并且形成了四点重要共识。

围绕税收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王军提出三点倡议：一是以丝路精神为指引，着力构建税收合作长效机制；二是建议在两到三年内，逐步实现“一带一路”多边税收合作规范化、机制化、实体化；三是通过建立税务局长定期会晤机制、完善税收协定网络、加强征管能力与人才建设等措施，拓展税收合作广度和深度，实现互利共赢。

哈萨克斯坦国家收入委员会主席腾格巴耶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税收在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障碍、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方面承担了日益重要的使命。进一步加强税收合作，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持和有力保障。

阿富汗税务局局长阿卜杜拉·扎德兰表示，此次会议提供了完善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凝聚各方共识、提升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平台。

维也纳经济大学全球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欧文斯认为，会议为税收促进全球经济平稳增长注入了动力，将成为“一带一路”税收合作的新起点，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是首次以“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为主题的国际税收会议，来自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00多位代表出席。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5-17

3、“一带一路”将成为能源合作新亮点

【全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日前在北京举行智库丛书成果发布会，国经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景春梅介绍了国际能源合作方面的研究成果。报告称，近年来能源生产中心“西移”而消费“东扩”，油气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变化使得能源合作环境更趋复杂。新形势下，国际能源合作亦呈现出新趋势，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能源合作新亮点，全球能源治理将成为能源合作制高点。

报告称，近几年国际能源合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能源生产中心加速“西移”，供应格局多极化。能源生产中心向“西半球”转移，打破了原来欧佩克主导的供应格局，北美特别是美国成为全球油气资源供应中心，加上俄罗斯、中亚的油气资源，油气供应方面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二是能源消费中心继续“东扩”，新兴经济体消费不断上升，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消费量不断增加。三是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进入“四分天下”的时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已成为一次能源消费中最具潜力的领域，未来有望与煤、油、气形成“四分天下”的格局。四是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使得全球油气大国的博弈更加激烈，全球能源走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五是地缘政治变化导致能源合作环境更趋复杂。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和能源独立政策正在改写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从去年的卡塔尔断交风波到沙特反腐，以及美国对俄罗斯、伊朗、朝鲜的制裁等都给国际能源合作蒙上了阴影，国际能源合作环境日趋复杂。”景春梅说。

在新的形势下，国际能源合作呈现出四大新趋势，一是维护共同安全成为国际合作新理

念。二是能源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仍然是合作的主旋律。三是共建“一带一路”成为能源合作新亮点。四是全球能源治理成为能源合作制高点。

现行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要么反映传统的能源生产国利益，要么反映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难以平衡新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诉求和分歧。“在此背景下，亟须构建新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维护包括能源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等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国的核心关切和整体能源安全，并充分体现新兴能源大国的利益诉求。”景春梅强调称。

1978年以来，我国能源合作从过去的“引进来”走向目前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从全球能源治理的跟随者变成影响者，在合作方式和合作理念上均有巨大提升。虽然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体量不断增大，但影响力仍然不够，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水平还不高，开展能源国际合作的总体能力与经济规模和体量还不相称。

“我们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形成一个我国深度参与的、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切和需求的以建设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景春梅无比憧憬地表示。

景春梅提出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深化能源国际合作，勾画一个区域的合作框架，同时勾画国际合作框架。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区域重点主要包括：一是推动与俄蒙中亚、西亚北非的战略对接。这些中亚国家是全球油气资源的核心地带，也是我国油气资源的主要来源地，应该与其开展全产业链的合作。二是推动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重点领域的对接，以点带面开展合作。三是推动与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能源合作的先期培育。

对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应发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助力提升目标国能源生产与利用水平。完善跨境输电通道，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促进我国丰富水电等电能在当地消纳。

对于中东欧国家，景春梅表示，这些国家对新能源和低碳的要求很高，应该着重在新能源方面与其开展合作。

对于“一带一路”伙伴关系，报告称应该建立包括能源交易市场机制、贸易和投资合作机制、能源过度金融化监管合作机制、能源企业合作机制、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在内的五大区域能源合作机制。

在能源交易市场机制方面，我国今年已经推出了原油期货，旨在建立亚太地区的原油交易市场，形成基准价格。在天然气方面，我们构建了上海、重庆等全国的油气交易中心，还有新疆的区域天然气交易中心，旨在构建亚太的天然气交易市场。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8-05-23

4、“一带一路”金融业方兴未艾

【全文】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正在金融领域扩大。5月14日晚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署了收购孟加拉国达卡证券交易所25%股权的协议文件。继2017年的巴基斯坦之后，孟加拉国成为中国向海外证券交易所出资的第2个国家。此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阿联酋也将在该领域推进合作。一带一路正在扩大至构筑证券交易所网络。

上证和深证收购达卡证券交易所股权的金额接近100亿孟加拉塔卡。围绕达卡证券交易所，中国和印度曾展开竞争。达卡证券交易所为实现证券市场现代化从2017年开始招募出资者，印度国家证券交易（NSE）所携手美国纳斯达克参与竞争。

在2月的招标中，上证和深证以每股22孟加拉塔卡的价格投标，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以15孟加拉塔卡投标，中方明显占据优势。但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要求孟方考虑价格以外的因素。经过与印方的直接谈判后，孟加拉在2个多月时间里反复展开讨论，但最后金额的差异

成为决定性因素。

本次是上证和深证第2次参股其他国家的现有证券交易所。2017年1月,上证和深证携手当地金融机构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收购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40%股权。中方持股比例达到30%。

中国在向达卡证券交易所出资的同时,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合作。上证与哈萨克斯坦建立了“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将于2018年内启动具体业务。4月,上证还与阿联酋就建立“一带一路交易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一带一路此前主要瞄准在中国、欧洲、非洲各国建设陆路和海路基础设施。在“中巴经济走廊(CPEC)”沿线建设发电站和港口就是代表案例。随着项目走向具体化,融资成为课题。截至目前,各项目主要由中方提供资金,但要维持业务,融资来源的多样化正变得不可或缺。

针对建立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的意图,担任上证理事长的上海市副市长吴清表示,将应对(对象地区的)资金和投资需求。武汉科技大学的董登新教授也指出,不仅是筹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还将有助于项目建成后回收资金。

融资来源的多样化还有助于缓解外界对资金过度依赖中国的警惕感。2017年12月,受困于还债问题的斯里兰卡政府把该国南部汉班托特港99年的使用权转让给了中国企业。斯里兰卡国内外出现了担忧安保问题的声音。如果当地的上市企业成为项目主体、在市场上筹集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能够减轻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世界大型金融机构正在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中寻找商机。面对基础设施投资等巨大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已开始积极扩大贷款和开发金融产品。可以看出金融机构意在与中国政府构筑良好关系,推动在华业务扩大。不过,仍存在各国会计标准和法律制度不同等风险,在吸引民间资金方面仍任重道远。

4月,中国银行在香港交易所发行了“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一带一路”相关信贷项目。发行币种不仅有美元和欧元,还有澳元和新西兰元,用于对相关国家和项目的贷款。此次是中国银行第4次发行“一带一路”主题债券,累计融资额超过100亿美元。

在香港,面向个人的金融产品也已出现。3月,美国资产管理公司景顺(Invesco)从当局获得了一带一路债券基金的许可,将投资有望实现高增长、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国债和公司债。

金融机构相继筹集资金的背景是,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庞大构想需要的资金仍未充分确保。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的统计显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在2030年之前需要7.442万亿美元。与此相对,中国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丝路基金”的规模仅为约550亿美元,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供的投资和贷款仅为44亿美元。香港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系智囊组织估算资金缺口每年为5000亿美元。

此外,中国的银行希望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步调,以加快全球化。中国工商银行4月设立了亚太区银团贷款中心,宣布了将增加中国以外贷款和人民币结算的方针。工行被认为在非洲具有优势,已经涉足了200多个相关项目。

全球金融机构还将一带一路视为在中国拓展业务的绝佳机会。汇丰银行(HSBC)将于7月在香港新设一带一路的负责人职位,美国花旗集团与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签署了业务合作备忘录。此外,日本瑞穗银行也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业务合作协定。

港交所等的合资企业实施的调查显示,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上海、深圳)的上市企业中,65%表示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一带一路相关业务。如果企业的活动趋于活跃,那么贷款、结算和资金管理等需求将随之增加。金融机构对此抱有巨大期待。

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还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提出了放宽国内限制、对外资放开证券业和

资产管理业的方针。香港投行的某高管认为,参与一带一路有助于在中国扩大业务。

不过,被称为现代版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项目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存在特有的风险。要推动民间资金积极涌入或仍需要较长时间。

【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网站 2018-05-25

5、首届“一带一路”上海论坛在沪举行 “一带一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文】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逐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成果。5月14日,正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一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上海论坛在沪举行。

全球极具活力的公共合作平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特别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后,“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认同和认可度越来越高,支持、赞赏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区域组织和国际机构越来越多。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为优化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获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已经成为全球极具活力和受欢迎的公共合作平台。

“人类历史表明,所有进步都是由伟大构想引领的。‘一带一路’最早是在欧亚腹地展开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曾给沿线各族人民带来机遇,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环境部门主任安格斯·麦基说,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对当代世界的重大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助于改变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落后面貌,为他们带来发展。此外,“一带一路”具有非常开放性的包容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国将能够进行更多的开放对话,促进更加公平、共享的发展。

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认为,为进一步使这一世纪倡议由良好愿景变为美好现实,我们要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对外解读,使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能够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旨在推动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真谛与要义。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启动、推进和运行过程中,要坚持开展政策沟通,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实践中的技术创新、政策创新与合作模式创新,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经验推广。于洪君表示,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关系进一步加剧,由此引发的国际格局转换和世界秩序调整都在向纵深发展。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一些国际关系准则,包括国际经贸规则 and 世界经济秩序受到了严峻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引擎”,带动国际格局变革的意义和作用将倍加彰显。

为进一步改善国际关系指明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格局的重大新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注入了新内容,有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为国际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指明了新方向。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国际广泛的事业。我们需要探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要界定他们需要什么,要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代生活经验和发展经验的对接,尊重不同国家的特殊性,避免重蹈西方霸权主义的覆辙。

“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为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品。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表示,“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品,它对世界秩序、国际体系以及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会带来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也会产生很多风险,如国际合约履行和金融合作风险,

国际犯罪、国际疾病和人口流动的风险,沿线生态安全的风险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将是“一带一路”能否成功的关键。

与会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和互通,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促进全球经济真正均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更为突破当前全球化发展困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为打造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大国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挑战,充分发挥地区区位优势 and 协同效应,探索国际合作新路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5-25

6、“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论坛在京举行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

【全文】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合作的新动力。为进一步顺应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需求,积极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流与合作,5月28日,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围绕“新市场,新机遇,新发展”的主题,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贸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的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开幕式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原第一副会长黄海主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副秘书长伊莎贝尔·杜兰特在致辞中表示,联合国一直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上的协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政策制定能力建设,提升其监管能力、服务生产力、竞争力和出口能力。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仲泽宇认为,市场需求、产业发展规律等为服务业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一个服务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正扑面而来。基于此,仲泽宇提出四点倡议,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共同推动服务业经济全球化,二是汇聚各方智慧和资源,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发展、国家能力建设,三是国际组织、民间机构、行业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民间力量优势,推动各国建立交流合作、互信机制,四是以跨境电商为抓手,尽早实现一批早期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活力。

在主题演讲环节,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赵冰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变现实,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与43个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中欧班列开行8000多列。目前,中国已与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03份合作文件,特别是去年首次高峰论坛形成的279项成果清单,已有255项转为常态化工作,其余24项正在有序推进。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开辟了新的路径,为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随后,赵冰围绕坚持开放创新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提出扩大合作开放、推动创新发展、提升贸易质量、发挥主体优势、加强保障支撑五点建议。

据悉,论坛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备忘录》,并提出《一带一路产业发展国家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还发起筹建了“一带一路”服务贸易联盟基金等重要推进措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推动联合国2030计划,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5-29

7、推动上合组织深化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带来新模式

【全文】近日，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智库联盟成立大会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这次论坛上，来自上合组织有关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制度安排”以及“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方向”两大议题展开讨论。

亟待释放合作新潜力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至今，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均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共同携手走过了17年的历程。2017年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7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推进，中国的开放理念及改革经验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市场准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些举措为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契机。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的选择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主动扩大进口。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不仅为自身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创造了新机遇，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增添正能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创新也应成为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向。如何释放合作潜力，使其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上海合作组织未来面临的新任务。

巴基斯坦商务部贸易发展研究所主任穆罕默德·伊利亚斯·高瑞表示，巴基斯坦非常愿意积极参与上合组织关于经济合作、贸易便利化的谈判中，已做好了准备在上合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上合组织成员国作为整体，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潜力巨大。各国不仅具有人口数量优势，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一脉相承，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靠近，且各国间的经济结构有着很好的互补性，这些都为区域间开展经贸合作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一带一路”带来新模式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的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逐渐成为上合组织区域合作新模式。”商务部亚欧司副司长王开轩认为，各国互补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贸易投资环境、日益开放的巨大市场，推动区域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孙力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上海合作组织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支持者和践行者，上海合作组织8个成员国中中亚地区占一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中亚地区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区，上合组织4个中亚成员国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实践证明，相关国家发展规划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加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相关国家从疑虑到观望再到积极响应支持，这其中“一带一路”建设与相关国家发展规划对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共商“一带一路”建设与各自发展规划对接已取得了“1+1大于2”的实效，目前双方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勇表示，上合组织各国要通过产能合作解决发展问题，寻求符合各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间的合作。逐步改变单一依存初级产品等结构问题，使上合组织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由现在相对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同时，应加强上合组织之间货币的互换，以减少汇率波动对各国的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努拉金·巴以多列托夫表示，欧亚经济联盟与“一

带一路”相关项目对接,为各国之间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更为便利化的条件,特别是货物流动的畅通。通过这样的合作模式和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还可以解决部分国家产能和能源过剩问题,包括可以建立输电线网络、石油天然气运输管网等。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纳扎罗夫·莎拉费金·哈克莫维奇认为,各国应该抓紧时间、抓住机会,集成各方努力来解决面临的一系列区域内的具体问题。如加强在交通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建立运输走廊提升本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这样,中亚国家可以把相关货物流直接引入欧洲市场,从而增加各出口国的收入,也会增加过境收入。此外,建议各国间智库交流要更注重分享各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经验,为别国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未来,随着上合组织智库联盟机制化建设进一步发展,通过智库联盟达成更多共识,为上合组织各国在各领域合作提供更好的决策咨询。

继续深化合作新方向

“各国应当力求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以及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有所突破,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机遇探讨合作新方向。”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表示,这些合作新方向包括改善营商环境、创新贸易投资方式、构建区域投资风险防范体系等。

商务部研究院欧洲与欧亚研究所所长刘华芹对未来如何提升上合组织区域内营商环境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要加强商事制度改革。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内商事制度改革,营造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待遇,提升行政效率,资质审核、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依法给予国内和外资企业同等待遇,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些方面可以与上合组织各方面对接,从而消除投资过程中的障碍,提升合作成效,取得项目的综合效果。二是夯实合作法律基础,重新审视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制定实施细则。三是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中尤其是上合组织框架下,反腐败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基础设施、大型项目建设过程中只要涉及海外反腐败和廉政风险控制的条款,要在构建廉洁丝绸之路框架下推进区域内大型合作项目反腐败条款的设立,建立多边和双边的反腐和廉政风险联动机制,力争打造廉洁的丝绸之路。

白俄罗斯经济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柳德米拉·斯捷邦诺夫娜·巴拉维克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新方向不仅是与中国合作的新方向,也是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各国合作的新方向。首先是交通和物流领域,希望建立全球基础设施网络,未来在网络范围内能够建立通往欧洲的一条交通运输走廊,包括铁路、公路运输走廊,实现集装箱快速运输。同时,要充分利用相关数字技术、利用大数据来拓展合作。此外,还要加强电信领域和投资领域的合作。

土耳其安卡拉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和表示,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之间能够发挥很多协同作用。上合组织与土耳其的利益密切相关,希望能够由土耳其作为中东和沿地中海地区的节点,推动“一带一路”落地,因为地缘政治所在位置,也决定了土耳其是连接中国、欧洲、非洲以及中东大陆桥的重要节点,土耳其本身拥有宏大的愿景,希望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一致的,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区域内一体化的合作,这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文化层面。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8-06-02

8、中国对外投资连续7个月增长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成亮点

【全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日前透露,中国对外投资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结构持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2018年1—5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298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478.9亿美元,同比增长38.5%,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68.8亿美元,同比增长12.9%;新签合同额854.9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7.8万人,5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8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万人。

高峰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四大亮点:一是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1—5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54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59.3亿美元,同比增长8.2%。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362.2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2.4%;完成营业额307.4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4%。二是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1—5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29.9%、15%、12.3%和7.6%。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三是东部地区仍为对外投资的主力,东北三省企业日渐活跃。1—5月,东部地区10个省市合计对外投资277.2亿美元,同比增长75.4%,占地方对外投资的78.1%。东北三省对外投资14.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8.2%。四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1—5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274个,合计730.8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5.5%。对外承包工程带动货物出口75.4亿美元,同比增长25.7%。

高峰同时介绍,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发展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香港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5.3%、7.3%、4.5%和6.8%。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增长11.1%;对东盟进出口增长11.9%。增长较快的国别市场有俄罗斯、印尼、越南等,增幅分别达到18%、16.5%和24.4%。在吸收外资方面,5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24家,同比增长106.5%;实际利用外资58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6%,折合9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2.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8%;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1.9%。

专家指出,中国进出口数据、对外投资数据、吸引外资数据都延续了此前平稳向好的态势,这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十分不容易。未来,随着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及中法、中俄等一系列多边、双边经贸合作共识走向落实,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有望更上一层楼。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06-19

9、中国与联合国签署关于开展“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合作意向宣言

【全文】在联合国外空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及联合国外空委第61届会议之际,与会中国代表团在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举办“中国的航天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和造福全人类”主题宣介会。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史忠俊大使、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出席仪式并致辞。加拿大、哈萨克斯坦、新西兰、挪威、阿尔巴尼亚、巴西等60多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使节和外交官,以及联合国和各国航天机构代表等共200多人出席。

仪式上,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与迪皮波签署了关于开展“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合作的意向宣言。田玉龙介绍了中国在深空探测、“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空间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进展与合作设想,强调未来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航空航天领域合作,和平合作开发外空。

史忠俊在致辞中阐明中国开放、平等、互惠、包容的外空国际合作理念,强调外空是增进全人类福祉的新疆域,中国愿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以合作促进外空探索,以

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以合作促进外空治理,致力于通过合作缩小“外空鸿沟”,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益,中国将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与各国携手,共同促进实现外空命运共同体愿景。

宣介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杨利伟还与迪皮波签署中国空间站合作补充协议,并向联合国捐赠中国空间站模型。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向联合国捐赠“北斗三号”导航卫星模型。

迪皮波盛赞中国航天发展的巨大成就,感谢中国航天合作对国际社会所做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向各国提供卫星遥感数据、开放中国空间站,并对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项目、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提供有力支持,充分展示了中方致力于和平探索利用外空国际合作的开放姿态。她表示,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工具,各国应加强外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服务于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来源】环球时报 2018-06-20

10、《“一带一路”5周年调查报告》:超9成受访央行预计“一带一路”倡议将带动经济增长

【全文】6月21日,国际金融论坛(IFF)在北京发布《“一带一路”5周年调查报告》,该报告是首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的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

报告表明,63%的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极其重要,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过去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倡议之一。中央银行的受访者几乎一致看好“一带一路”倡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报告显示,92%的中央银行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能够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其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带动年增长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有25%的受访者态度则更加乐观,预计带动的年增长将介于2至5个百分点。

报告称,对增长普遍乐观的预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同时,有35%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本国的重要性要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的受访者认为高于世界银行,14%的受访者认为高于地区性发展机构的项目。

报告还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仍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调查表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发展的最大障碍依次是法律框架、融资、政府部门和信用评级。

报告认为,化解风险和挑战,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合作,完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信用,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开放性,也需要推进“一带一路”多边体制和机制建设。

报告由26个具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的调查回收问卷组成,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中国与双边及多边共同就“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开展合作所呈现的成果、问题及经验。

【来源】新华社 2018-06-22

深度透视

1、李向阳：用正确义利观指导“一带一路”建设

【作者】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正文】习近平主席在谈及“一带一路”建设时曾说：“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体现的是政府与企业的目标融合、中国与参与国家利益的融合。“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坚持“义”，“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全世界获得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不脱离“利”，就是要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而是双赢。只有这样，“一带一路”建设这一百年大计才具有可持续性。

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中义利观的要义和内涵，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协调予与取的关系。在正常的国家间经济合作中，予和取应该维持大致的平衡；但对有些国家则需要多予少取，甚至是只予不取，也就是允许搭便车。这是由国家间的差异所决定的。二是协调输血与造血的关系。要实现共同发展，需要参与国家具备造血功能，但有些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恰恰缺少造血功能，这就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其进行输血。运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三是协调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关系。利的目标通常具有短期特征，而义的目标则具有长期特征。四是协调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关系。政府和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吻合。如何引导企业在获利的前提下实现义的目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总之，在义和利的辩证关系中，要使两者做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多数时候义利兼顾，需要时舍利取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跨国融资体系、跨国财税体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管理体系以及“一带一路”本身的治理结构。

【来源】人民日报 2018-05-07

2、李永全：“一带一路”为上合组织注入新动能

【作者】李永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核心观点】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即将在青岛举行。这是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必将在上合组织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值得指出的是，上合组织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支持者和践行者，“一带一路”倡议在上合组织地区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之地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上合组织地区提出的，首先得到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拥护。

“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如果说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特点是“引进来”，那么现在，则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还要“走出去”；如果说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地区是东部沿海，现在则是通过“走出去”带动西部地区发展。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首先面对的就是上合组织成员

国。

上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国所在的中亚地区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可以说正是上合组织的存在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形势下进行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政治、安全、经济 and 人文领域密切合作,营造了友好和谐的氛围。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探索合作模式和项目,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秉持全新理念的区域发展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将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最先在上合组织地区提出有着深刻政治经济背景。首先,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政治互信和合作机制;其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中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市场、资源等方面有巨大的互补性;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充分考虑了中亚国家,尤其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因此,上合组织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之地并首先受到认可和支持绝非偶然。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接的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近五年来,中国与周边和沿线国家的合作有长足发展。无论是新提出的项目,还是原有项目,都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而得到升华。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对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落实连接多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或涉及各行业合作的项目往往存在许多政策和操作层面的困难,而如果能和各国或国家集团既有的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则会使合作比较顺利地进行。在这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也走到了前面。

2014年1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领域,该政策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合作方向十分吻合。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见证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文件的签署。中哈发展战略对接结出一系列果实。

2015年5月,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一文件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务实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明确指出了上合组织的平台作用。在这一文件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对接合作领域取得重要成果,除上述中哈发展战略对接实践外,还有中俄地区合作对接,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园、中国和白俄罗斯工业园项目,以及多边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中吉乌铁路、中国西部—欧洲西部公路项目等,都取得重要进展。

践行“五通”的示范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综合性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要打造“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之间在落实“五通”方面的合作堪称典范。

在政策沟通方面,上合组织有比较完备的沟通机制。上合组织宪章等基础性文件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和政治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政治保障。这里的政治保障既包括政策交流,也包括项目安全。

在设施联通方面,上合组织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中吉乌铁、中吉乌公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以及途经中亚和欧亚地区的中欧班列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

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具有重要意义。

在贸易畅通方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开辟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与其他成员国和伙伴贸易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在资金融通领域,上合组织财长会议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合组织银联体等机制积极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融资合作,扩大本币互换与跨境结算。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或上合组织账号一旦确立,将会为务实合作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在民心相通层面,上合组织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文化、科技、教育、旅游等合作形式日益丰富,其发展潜力正受到各国关注。

由于上合组织内部相互了解和互信水平高,“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个地区赢得支持与发展,取得先期成果乃意料之中。

从上合组织走向命运共同体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此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回应世界发展趋势和各种挑战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实践,而上合组织则是践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体框架,其中有五个经济走廊处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所在区域。在人文合作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文明多样性尤其明显,科技、教育、旅游等产业前景广阔——人们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在这条连通历史与未来的道路上同舟共济,“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相得益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雏形将渐渐清晰。

【来源】光明日报 2018-05-23

3、陈甬军：“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开放的理论分析

【作者】陈甬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商学院教授）

【正文】 对外开放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呈现三个基本特征：目标导向、系统平衡、联动开放。

第一个特征目标导向，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总体发展目标的牵引。十九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这两个目标就从总体上决定了十九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是目标导向，也就是要以实现这两个目标出发来实行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安排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度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广度，从而努力使经济发展适合这两个目标发展的要求。

系统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征。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往往是不平衡发展的。但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又必须控制这个不平衡发展的程度和时间。十九大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转化的分析，从根本上决定了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充分发展的同时，必须把解决不平衡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必须“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如何解决好目标导向、系统平衡这两个问题？除了要继续进行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积极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之外，还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联动开放。这首先是由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内外联动,以充分利用资源和比较优势,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经济学理论表明:当一国的产业结构符合经济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时,其贸易和投资结构会达到最优。但是一国的禀赋要素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发生变化,比较优势也就随之会发生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反映。而实行开放经济就是推动实现这个变化链条的催化剂和助推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说明了这个道理。经过发展和积累,我国的经济禀赋已不再是初期单一劳动力廉价充沛的唯一因素,而是形成了包括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多元化结构。

正因为如此,十九大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要求。明确不仅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还要构建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其次,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还与实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担当有关。从更高的层次看,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就必然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与世界经济联动发展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经济也是中国通过积极参加全球分工和治理结构体系,成为引领全球化发展过程的领跑者的助推器。

“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开放的内在机理

在实践中,助推器的作用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来实现。“一带一路”提供了新时代国际合作和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新模式。它通过其内在的合作实现“多赢”的机制,可以给全世界的发展提供“一带一路”的红利。这个机制的作用既符合现代经济发展内在通过对外开放进行资源市场配置和比较优势提升的要求,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途径,从而奠定了它引领新一轮开放的基础地位。这在十九大报告里关于“一带一路”的新定位已有基本体现。

十九大报告里对“一带一路”的定位,第一是从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角度,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强创新能力开发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是从实体经济活动的角度。第二是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提出促进“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这个词是第一次出现。这两条实际上就反映出“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之间的联系: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扮演好引领全球化的角色,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参加合作的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规则,签约履约进行项目合作建设,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观察,“一带一路”就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可用供求结合的经济模型来说明。中国的供给要素有三样:第一个是产能。通过40年的发展,中国有充足的产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第二,有高中端的技术。以动车、高铁为代表,还有港口、核电站、桥梁、高速公路的建设技术在全世界领先。第三,中国的外汇存款。最高时达4万亿美元,现在有3万多亿美元。这三样是供给要素。

需求方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30年来逐步完成了这个过程,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重走中国的这条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所以迫切需要基础设施。这样,就可以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的国际合作商业模式,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由此而生,所以“一带一路”倡议是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一带一路”并不限于沿线的65个国家。非洲国家本身很缺乏基础设施,欧洲的工业强国这几年苦于需求不足,增长乏力。法国有空客、核电,英国有创意产业,德国有工匠精神、精密机械,意大利有奢侈品产业。把它们的技术和中国的建设能力相结合,与中国的企业组

成一个联合公司,到需要基础设施项目的亚洲、非洲国家合作搞建设,不但可以获得多赢,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合作中学到很多东西,提高效率。

更加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对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假设今后“一带一路”建设每年有400亿美元的投资,按照投资乘数1:5计算,那就创造了2000亿美元的需求,就可以弥补全世界需求不足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助推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经济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内在进行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机制,就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发挥作用,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得到了发挥和提升。这就符合对外开放的基本要义。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时发表的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一带一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运用一个全新的国际商业模式,与世界各个国家进行项目合作建设,助推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了一个具体对话和具体实现的平台和纽带。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既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的宏伟远景,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国崛起的和平模式。它的这个内外联动性质决定了它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用高质量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是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基础。用“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开放的理论观点就是在这个机理上形成的。

【来源】浙江日报 2018-05-28

4、傅梦孜:“一带一路”五年历程波澜壮阔

【作者】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正文】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近五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并在全球层面展开的最具抱负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是中国迄今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倡议。

它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它面向全球、陆海兼具、目的明确、路径清晰、参与方众、影响热烈。虽然,五年只是历史的瞬间,但这五年却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大范围、多形式互联互通的全新征程。由起步到如今,五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首先,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内涵外延充分拓展。“一带一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作为提出者引领了该倡议的宏大设计。在启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勾勒了这一宏大倡议的蓝图,确立了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机制等内容。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除海上既有通道建设外,要“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一带一路”地理范围已突破亚非欧,面向全球;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陆、海、天、网丝绸之路建设方案逐步形成,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等日益受到重视;“一带一路”是一个朋友圈,向所有伙伴开放,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其开放与包容性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机制到位,保障有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内各地方政府也及时成立相应机构,出台相应的地方方案。国内高校、智库成立的“一带一路”研究院所和中心数以百计,学科建设提上日程,数据库建设、风险评估、跨学科研究等成果甚众,为推动相关建设提供越来越多的智力支撑。

在全球范围,双边合作进一步加强,多层次、多渠道沟通全面展开,双边与地区联合工作机制全面建立,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的国家越来越多,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的数据,中国已与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3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2017年5月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共形成279项成果清单,目前已有255项转为常态化工作,其余24项也正在有序推进。亚投行完成扩容和体制建设初始阶段的重心目标,至2018年5月,亚投行成员数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加到86个,并开始市场化运营,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已达26个,涉及十多个国家,贷款总额超过45亿美元,覆盖交通、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城市项目。至今年5月,丝路基金已签约19个项目,承诺投资70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金额800亿美元,其投资包括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等,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宣布提供的额外融资,进一步支撑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能力。

再次,五通目标扎实推进,部分愿景已成阶段性现实成果。

政策沟通:在国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已然走出初期的陌生与模糊阶段,日益得到各国越来越清晰的认同。在重大国际、地区和多边场合,习近平主席致力于“一带一路”倡议释疑解惑排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抓手,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巴基斯坦“愿景2025”、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越南“两廊一圈”、印尼“全球海洋支点”等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政策沟通为相关国际项目的推动提供了先导性支持。

设施联通:成都、重庆、郑州、武汉、苏州、义乌、哈尔滨、长沙、昆明、石河子、合肥、长春、厦门等多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线路,包括渝新欧、汉新欧、蓉欧快线、郑新欧、苏满欧、湘欧快线等,途经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最长线路的里程超过1.3万公里,迄今累计开行突破8000列,通达欧洲14国和42个城市,进入常态化运营。

贸易畅通:“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扩大贸易提供了全新机遇,在近年来全球贸易萎缩大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运输便利化形成的畅通局面使双边贸易迅猛增长。商务部统计,2014—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7年达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2014—2016年中国企业对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相关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达3049亿美元。今年1—4月中企对相关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7.3%。

资金融通:“一带一路”巨大的资金需求使资金融通更为迫切,德国证交所等“一带一路”债券发行,中国与英国为欣克利角核电站提供主权信用担保,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近三十个国家货币实现与人民币货币互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创造了先期条件。

民心相通:五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明显加速。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之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与相关国家互办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图书展等,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推进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旅游、政党、智库、青年、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与此同时,大型重点建设项目滚动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中蒙俄走廊得到三方政府高度支持,进入深化产能合作阶段。2016年11月,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正式通航,可承载5万吨级的货轮驻泊,成为港口建设早期收获重要标志。中欧班列开启了亚欧大陆桥新的互通格

局,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开通,中国—中南半岛(中新经济走廊)的西线—中缅通道建设加快,其建成将直接为中国西南地区提供出海口。中国从中东和非洲经由印度洋海运来的进口原油(年输送量达2200万吨,约占中国每年石油进口量的5%)和液化天然气,到达缅甸若开邦首府实兑的皎漂港输送上岸接驳油气管线,可绕开马六甲海峡,直接进入中国西南。迄今尚无一条铁路的老挝因为中老铁路2017年底开工将改变这个国家交通运输的历史。中泰铁路(曼谷至呵叻段)在建,如果形成辐射效应,后续的呵叻至廊开段势将开工,将形成中新走廊中段的贯通。由于成昆公路已贯通运营,中新走廊将实现公路铁路双线运输局面。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绩同样突出,比雷埃夫斯港口一期工程完工,吉布提新港一期已完成12个泊位建设,科伦坡港口城建设虽经挫折但已复工,皎漂港、汉班托塔港口、达尔文港口等全球20个在建工程以及正在谋划桑给巴尔等港口建设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全新的联通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新时期中国周边及全球外交的重大举措,标志着中国启动以互联互通为导向、首重周边、延及亚非欧大洋洲等地区、范围广阔的全球经济布局。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亮点纷呈、成果斐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不尽人意,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不时躁动,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及分裂主义寻机作祟,地区冲突、地缘竞争与博弈并未消停。“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地域广,建设周期长,复合项目多,投资规模大,加之各国国情、域情殊异,风险与挑战相伴相随,但五年来的建设发展历程,已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球化挑战此起彼伏,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的获得感让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红利中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破解经济全球化困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展望未来,人们相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必将在一个又一个五年中,一步一个脚印地为世界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光明日报 2018-06-24

交流与成果

一、交流合作

1、我校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高级研讨会

【全文】5月26日,由我校主办,学校“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上海市法学会联合承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高级研讨会在古北校区隆重举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校长朱国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申卫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组合处副处长周璞、国家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新信息与技术研究部副部长尚庆琛、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贸发展处处长尤永生、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会展业处副处长张燕萍等领导,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史志钦教授等一批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在该领域拥有卓越影响力的著名专家和知名学者,承办方代表学校“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永辉,上海国际贸易学会会长、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上海市法学会研究部张志军主任出席本次会议。朱国宏、申卫华和史

志钦分别致辞。会议开幕式由副校长陈洁主持。

朱国宏在致辞中阐述了召开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向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我校作为我国开放经济理论研究、决策服务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建校近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校教师积极投身于国家开放经济前沿理论研究,为国家部委、上海市及其他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对外开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校先后组建了上海“一带一路”协同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等多个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门研究机构,并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学校组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旨在通过整合目前校内“一带一路”经贸领域的研究资源,提升决策咨询研究水平,为取得重大成果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他希望我校“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积极与国内同行合作,加强校内“一带一路”研究人员和国内同行专家的交流合作,共同为国家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申卫华在致辞中阐述了上海承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意义,从招展、招商、论坛筹备、城市保障、一站式交易服务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他指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为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带来很强的直接效应、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是推动上海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最好载体,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共同为进口博览会办成国际一流博览会献计献策,共谋发展。

史志钦在致辞中指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各高校和智库也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广大学者去研究和解决。如何把“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成为一个国际合作的共赢的平台,以此作为一个抓手和载体,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任重而道远。他向我校成立“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表示祝贺,并表示清华大学今后将在“一带一路”与我校开展密切合作,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学界应有的贡献。

会上,朱国宏与史志钦共同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揭牌。

随后,周汉民作主旨演讲。他指出,举办本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次会议是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历史进程中,上海和我校的地位和作用。他用一组数据对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生的巨大变化,回顾了经济特区成立、浦东开发开放、中国复关与加入世贸组织、上海成立国内首个自贸区等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亲身参与建设的重要事件和节点。

他阐述了自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五年的实施过程中遵循“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载入联合国文件。“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六条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方向。他结合自己考察的经历,讲述了我国的企业从业人员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进行艰苦奋斗的故事,希望我校专家学者在“一带一路”研究中多开展实地调研,鼓励学生以“一带一路”建设企业从业人员为榜样,立下报效祖国的志愿。

针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做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发挥桥头堡作用,特别需要促进民心相通,而当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就是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具有三个特征即综合性、专业性和并重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贸易功能与投资功能的综合,在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要体现出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国家战略和世界发展并重、中国诉求和世界希望的并重。

周汉民最后总结他主旨演讲的三个主要观点:一是上海举办中国进口商品博览会是再一

次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进一步深刻影响世界;二是“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去规划世界,而是中国去融入世界。上海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承载国家自贸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任务,使命是光荣的。三是进口博览会是促进“一带一路”实现“五通”的平台,特别是成为民心相通的平台。

随后,会议进入主题报告环节,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王军委托副处长周璞作了题为《刷新国际合作平台,增享共同发展动能,“一带一路”建设回顾》的报告;史志钦作了题为《“一带一路”建设:新时代、新机遇与新挑战》的报告;黄建忠作了题为《进口博览会推进高质量开放》的报告。刘永辉主持主题报告环节,我校国际经贸研究所所长、国际合作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梅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刘作奎对三个主题报告进行了点评。

当天下午,会议分别举行“中国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研讨会”和“中国进口博览会法律问题研讨会”两场分论坛,刘永辉和法学院院长倪受彬分别主持两场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分论坛主题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全面开放新格局、进口博览会的法治保障、世博会法治建设对中博会的启示与借鉴、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与进口博览会、从跨国公司视角看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机会和挑战、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法律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学校成立“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得到了来自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的祝贺以及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学校收到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孔子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19封贺信。新华社、人民网、光明日报社、中国网、《文汇报》、《青年报》、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广播电台、澎湃新闻、周到新闻等媒体对本次会议作了报道。

“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是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需要而创设的校级实体性研究机构。研究院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前沿领域与热点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重点研究方向包括: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经贸关系与合作研究;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次区域经贸关系与合作研究;3.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战略研究;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5.上海建设“一带一路”桥头堡战略研究等。

目前,高等研究院汇聚了校内中东欧研究中心等12个相关国别研究机构共同发展,借力学校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的三所孔子学院和捷克孔子课堂,旨在发起、协调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研究,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力争使高等研究院建设成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官方网站 2018-05-27

2、周汉民教授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高级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

【正文】5月26日上午,在我校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高级研讨会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我校杰出校友周汉民教授作主旨报告。演讲中他指出了举办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回顾了上海和我校在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浦东开发开放、中国复关与加入世贸组织、上海成立国内首个自贸区等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亲身参与建设的重要事件,阐述了自己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认识和理解。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周汉民教授的报告,认为报告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思想深入、建议

前瞻,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开放性与前瞻性,周汉民教授全程脱稿演讲反映出他深厚的学养与深入的思考。与会我校师生受到深深的震撼,为我校汪尧田教授、裘劭恒教授,为校友周汉民教授及很多校友前辈们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做出的学人榜样感到光荣和自豪,深感在中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师生责任在肩、使命光荣。

以下是周汉民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

今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办以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为主题的研讨会,我认为意义十分重大。其实探讨到这一题目,就是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历史进程中,上海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地位和作用。

让我们做一点回溯,时光如梭,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前,1978年我们中国的GDP总值是3000亿美元,2017年跃升到12.7万亿美元。根据推算,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76美元,2017年人均GDP是8600美元。经济总量增长了40倍有余,人均GDP增长百倍有余。贸易方面,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和209亿美元,201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41000亿美元,贸易额已连续四年居世界首位。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哪几个节点值得我们关注呢?第一个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潮流是始于1978年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十年,在广东和福建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建立。而海南从行政区划中在广东省的管辖内,独立成为中国今天最年轻的省份,在成立的第一天将3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交付给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验,中国第五家经济特区因此诞生。这其中,1984年国家决定在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上,要选14个城市,命名为沿海开放城市。最北的是大连,最南的是北海。在这一万八千公里长的海岸线中,14个城市的中点就是上海,上海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波大潮中凸显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仅仅过了两年,1986年7月11日,国务院决定向关税贸易总协定提出恢复席位的申请,我们简称为叫复关。1994年12月31日关贸总协定结束历史使命,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作,我们开始入世的进程。国家提出我们复关申请三个月内,在炎炎烈日下,母校诞生了全国和上海第一家关税贸易总协定研究中心,为中国复关入世15年零5个月的征程做出了中国学人最独特、永远不能被磨灭的贡献。

今年是关税贸易总协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汪尧田教授诞辰100周年,我郑重向朱校长建议母校应举办隆重的仪式,以学术研讨的方式来纪念母校这位杰出的教授,他是中国学人的榜样。他组建关税贸易总协定研究中心时就有这样的勇气、担当和成就。中国第一部《关税贸易总协定总论》和中国第一部《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就诞生在这里。我当时是他的助手,和他同时担任主编。这样的历史是不能忘怀的,母校要纪念为我们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历史征程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学人。今年也是裘劭恒教授诞辰105周年。他在世的时候就说过如果一个人一生有一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就十分欣慰。他做了三件大事,东京审判时中国的助理检察官,“四人帮”审判特别法庭特别顾问,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我说这段话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我老师的神情,那种坚毅、奋斗、担当,我多么有幸是刚才提到的两位老师的学生。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是绝不能忘怀的。1990年国家赋予上海特别的使命。1990年4月18日宣布浦东的开发和开放,最早研究的一批学者中就有我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陈雍教授,我们共同写下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文章。陈雍教授为我们浦东开发开放第一批法规九项立下汗马功劳,我是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九项法规的英语翻译总审定,任命状是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发给我的。浦东开发开放28年来,去年中国上海的GDP总量3万亿,浦东接近1万亿,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科学发展的先行者。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横空出世,上海勇立潮头始终是使命。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对上海四套班子领导成员说要“四个着力”,其中就有一个着力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演讲时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深刻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他提出中国再开放的四个步骤:第一,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第二,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第三,用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第四,中国要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们将进口博览会称之为“6+365”,6天会期,365意思是每年,要连续举办下去。

今天,母校将这两个国家正在推进的事业放在一起研讨,我觉得十分有远见和意义。我谈一下我对“一带一路”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认识。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三周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五年之后,“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最瞩目的公共产品,因为这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当今经济全球化是潮流,但是不能掩盖经济全球化的许多弊端,否则就不会提发展的赤字,和平的赤字,正因为有这些赤字,人类社会需要与时俱进,但是不能逆全球化潮流而动。

2015年3月,我国郑重提出“一带一路”三个原则:共商、共建、共享。2015年习近平主席到访英国伦敦,在工商业大会发表的演讲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条路不是一条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这条路是指“一带一路”,不是私家小路就是告诉世界,不是中国去规划世界,而是中国去融入世界。这是十分重要的理念,不是规划,是融入。什么叫携手前进,携手前进就是要共商,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在共商的基础上,一定要达成共建。我们必须共享成果,由此提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和法学的倡议,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正式提出的,就在2016年和2017年,联合国文件载入三项原则。由此我们看到和86个国家签署了101个协定,协定就是国际管理,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四年的直接投资600亿美元,我们在相关国家为当地提供22万个就业岗位,为当地缴纳20亿美金的税收,我们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接近一万亿美元,也就是占中国外贸的四分之一。我们的企业,我们企业的从业人员在“一带一路”国家艰苦奋斗。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有六条走廊。第一条是新欧亚大陆桥,从中国的连云港起步一直到荷兰的鹿特丹,今天我们所谓的中欧班列就开在这条道上,时至今日中欧班列开了七千余列。第二条是中亚经济走廊,从乌鲁木齐出发,一直到柏林,与西欧亚大陆线融合。第三条是中南线,从昆明出发涵盖东盟的十国陆上领土。第四条是中巴经济走廊,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建设和推进。第五条走廊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第六条走廊是中孟德经济走廊。去年6月,我国首次向世界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分别是涵盖亚洲和大洋洲的东向、涵盖非洲进入地中海的西向和绕过整个大陆到北极和北冰洋的方向。

最近这一年,我国提出两个重要的新主张,一是“一带一路”可以惠及更远的地方,比如到南美洲,二是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的理念,那就是开拓北极航道。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上作重要讲话中说的一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去年我率团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察,第一站考察伊朗,我为大使馆成员作了讲座;第二站考察哈萨克斯坦,发现哈萨克斯坦许多官员中文说得很好;第三站考察俄罗斯,感受到俄罗斯各级官员真诚愿意与中国合作。上个月我去了尼泊尔,几乎没有一块地是平整的,在大使馆谈话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两次停电,这就是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我们要应对的困难。在越南,我看到了胡志明市朝气蓬勃的景象。我建议母校高等研究院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察一下。

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上海电器集团在越南建了四个大发电厂。为了建设这四个发电厂,现任越南分公司的主管在越南待了整整18年,他告诉我,刚去越南的时候他孩子才两岁,现在回国探亲孩子不认识爸爸。我讲这些是希望在座的学生们从小就要立为国效劳的志愿。

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发挥桥头堡作用,如今最要紧的平台就是要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要做到“五通”,分别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流通和民心相通。上海的桥头堡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力让民心相通。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十分关键，因为上海承载国家自贸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三大任务。

但是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希望了解它的三个特征。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一个特征是综合性，综合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贸易功能的综合，国际贸易分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这是我1995年提出的主张。这一次国际博览会在贸易方面要综合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功能。其次当初的TPP现已更名为CPTPP，有十一个国家签署，冻结了当年TPP的5%的条款。此外还有美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TTIP协定。如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密不可分，贸易和投资互为因果，互为促进，分不清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最明显的划分。由此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二个表现就是来谈生意的，不仅仅是贸易商，还有许多投资商。最后，我们取名叫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难道来的人就单单谈卖什么给我们吗？第三个综合就是进口博览会不单单只是进口，还可能出口，这都体现了综合性的特点。

第二个特性是专业性。如今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投资发展，已经让我们目不暇接了。博览会中，许多进口商品的商检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考验。这次我们将借进口博览会的平台把世界发展的脉络梳理得更清楚，因而专业性的要求特别高。我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文章题目是《让“小白菜精神”在中博会绽放光芒》。小白菜是指志愿者，这次一定要选拔一批专业志愿者长期服务于我们这次进口博览会。

除了综合性和专业性，这次进口博览会要体现经济效益的并重，要体现国家战略和世界发展的并重，要体现中国诉求和世界希望的并重。所以第三个特征表现为并重性。

最后，我总结一下主要的三个观点。第一，上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再一次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希望能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通过努力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第二，“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去规划世界，而是中国去融入世界，上海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承载国家三大战略，使命是光荣的。第三，进口博览会是促进“一带一路”实现“五通”的平台，特别是成为民心相通的平台。我们十分期待作为今年中国主场外交收官之作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官方微信网站 2018-05-26

3、上海市第一期“一带一路”中小企业经营人才培训班在我校古北校区开班

【全文】5月29-30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属的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我校国际与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上海市第一期“一带一路”中小企业经营人才培训班在我校古北校区举办，共有113位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参加了本次培训。此次培训班的宗旨是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上海本地中小企业家全球化视野，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戎之勤、我校副校长徐永林等出席了开班仪式。戎之勤在开班式致辞中提出，希望参加培训的企业家学有所成、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把握机会，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徐永林代表学校对此次培训班诸多学员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希望国际与继续教育学院以此为契机，加强与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全方位合作，深入探索校政企合作的新模式，为提升学校服务上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搭建更多平台。

本次培训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详解及机遇》、《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税务筹划》、《中小企业的战略思维》和《对外投资中常见的法务纠纷与应对策略》等专题，邀请了我校张鸿教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侯洁琼等专家学者做了系列讲座。两天的课程讲座，得到了

市经信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和企业家们的高度赞扬,所有学员均表示通过学习,受益匪浅。6月27-28日,本次培训班的第二阶段教学将在古北校区继续展开。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官方网站 2018-06-06

4、我校举办“一带一路”实践中国际经贸规则创新高峰论坛

【全文】6月9日,由我校主办,法学院承办的“一带一路”实践中国际经贸规则创新高峰论坛在松江校区信息大楼503会议室举行。论坛由法学院国际法学学科带头人张庆麟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等13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著名国际法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论坛。

副校长陈洁为研讨会致词,对本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陈洁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沿革和近年来取得的成绩,阐述了国际法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法学人应当努力的方向。

论坛分为“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金融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创新问题三个环节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分别从“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便利化和投资保护、投资争议解决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个角度对“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国际经贸规则创新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本次论坛旨在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索相关国际经贸规则创新的路径和方法,推动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顺利开展,强化上海作为“一带一路”桥头堡在国际经贸合作共建中的引领作用。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官方网站 2018-06-13

二、学者成果

1、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系列研究报告

【作者】刘永辉,周平,刘冬平,尚宇红,黄建忠等(“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

【摘要】起始于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畅想。随着两大倡议的提出,曾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两大倡议高度契合了沿线国家谋发展的需求,能更好地增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交流合作。两大倡议的一个核心内涵是积极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自提出以来就受到越来越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从“一带一路”示意图(图1)可以看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主路线是从中国出发,向西从中亚出去经中东欧到西欧,而中东欧16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占了四分之一。中东欧16个国家全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位置独特,向西辐射欧洲,是中国进入欧洲腹地、实现欧亚大陆联通的必经之路。

中东欧16国根据地理位置可分为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国家和东南欧国家(图2),波罗的海国家包括位于波罗的海最东端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国,中欧国家包括位

于欧洲中部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4国,东南欧国家包括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9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显著增加。2016年中国海关统计显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为586.54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长4.6%,占中国与欧洲贸易额的10.19%。其中,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出口455.4亿美元,增长3.8%;自中东欧国家进口131.14亿美元,增长6.1%,中方顺差324.26亿美元。在中东欧16国中,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等中欧4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此4国的贸易额达428.7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额的73%;中国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3国的贸易额达38.4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额的7%;中国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黑等东南欧9国的贸易总额为120.8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额的20%。2017年1—4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总额为198.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其中,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出口143.8亿美元,增长9.4%;中国自中东欧国家进口54.8亿美元,增长18.9%。

然而,中东欧地区并非同质化的地区,中东欧16国不仅在面积和人口规模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营商环境、贸易体制上也有所不同。中东欧16国中已有11国加入欧盟,受欧盟共同的贸易政策、技术标准约束,而尚未入盟的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和阿尔巴尼亚等5国均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贸易体系日益开放,贸易体制逐步与欧盟接轨。

中国企业在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时应充分考虑到16国的共性和差异性,既注重与整个地区的发展合作,又注重与重点贸易伙伴发展关系,还要兼顾国家和地区间的平衡。为了及时反映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和各国贸易发展状况,展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发展轨迹,对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和16国的贸易活动进行科学精准的画像,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整理和分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信息,并以此为基础研制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系列。

为编制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系列,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刘永辉教授、黄建忠教授、刘冬平总会计师、尚宇红教授、高运胜教授、汪建新教授、张建新副教授、李莉副教授、周平博士、孙辞海博士、周昀博士等人,以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硕士研究生鞠卓、冯建滨、张政、潘文捷、任一平、石大伟、国琴、高天翼、黄杨等同学调查、收集、整理和分析了大量数据,包括2010年—2017年中国对中东欧各国的进出口季度数据、2007年—2016年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和人口年度数据,并在2017年第4季度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及生产资料市场商家、广州广交会商家和国内从事对外贸易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系列的编制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遵循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综合运用了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多种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该指数编制的目的是为参与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政府机构、国内外企业以及个人提供决策依据和信息服务。

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系列包括五个核心指数:中国—中东欧贸易竞争力指数、中国—中东欧贸易活力指数、中国—中东欧贸易潜力指数、中国—中东欧贸易信心指数和中国—中东欧贸易阻力指数。

为了全方位、定量地描绘2007—2016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贸易发展状况,我们以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为基础,编制了中国—中东欧贸易指数系列,包括2010年1季度到2017年2季度的中国—中东欧贸易竞争力指数和中国—中东欧贸易活力指数,2007—2016年中国—中东欧贸易潜力指数和中国—中东欧贸易阻力指数和2017年4季度中国—中东欧贸易信心指数。基于上述指数计算结果,我们发现:

1、从地区层面来看。近两年中国与中东欧地区之间的贸易发展减速,中国出口货物在中

东欧国家的竞争力同比和环比都略有下降,贸易成长性不足;虽然竞争力有所下降,中国出口货物在中东欧地区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市场占有率较之前仍有所上升;此外,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潜力仍值得期待,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和专家学者都对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机会和势头非常乐观。

2、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出口到捷克、波兰等国的货物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在中东欧16国中始终居于前列,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却有待于进一步地开发;中国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联系相对不太密切,同期出口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的货物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在中东欧16国中始终居于后几位,但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潜力却是中东欧各国最高的;中国与东南欧国家的贸易是最具活力的,中国出口货物市场占有率的增长幅度也是最大的,贸易潜力还可进一步挖掘。

3、从货物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优势产品皆为机电产品,使得中国出口货物与中东欧地区进口货物的重合度并不高,货物相似性指数小于0.4,双边贸易的互补性还有待提高。21类货物中,中国货物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是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和运输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和原料、家具、玩具和杂项制品。尤其是以纺织品、鞋帽制品、家具玩具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在中东欧地区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这也是中东欧贸易从业者最具有贸易信心和认为最有贸易势头的产品。

依据中国与中东欧贸易指数计算的结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经贸指数研究院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从地区、国家和货物三个层面提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的建议:

1、从地区层面来看,应充分考虑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与欧盟构成了统一的欧洲市场,16个中东欧国家中有11个国家已加入欧盟,对欧盟市场和资金具有高度依赖性,且在产品安全、技术标准等方面均采用欧盟标准,是中国产品生产、销售、品牌再塑造、实现产品“欧洲化”重要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中东欧交通便利,运营成本低,是俄罗斯之外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军西欧的重要桥头堡。但与经济作用比起来,中国更应当看重中东欧国家的政治作用,拓展合作也需要顾及欧盟因素。

2、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兼顾中东欧各国发展诉求,实施差异化战略措施,扩大对外投资,着力缩减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顺差,以实施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能可持续地发展。具体来说,应在保持与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与其它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合作,建立协调的多边贸易关系;应对中东欧各国应进行“精准式”合作,真正做到互惠互补、规模和档次适度;在加大与中东欧各国开展货物贸易的同时,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创造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提升通关效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采用多种方式搭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商品贸易的渠道和平台。

3、从货物层面来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结构单一,应优化贸易结构,实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优势产业的有效对接。具体来说,应根据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特征,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产业园区”,推动双方在工程承包、计算机等领域的合作,构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多样化网络布局;加强双边基础设施合作,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帮助中东欧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助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促进中国在高铁、核能等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输出。

【关键词】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东欧贸易;丝绸之路经济带;“16+1”合作;一带一路

【来源】文汇报第10版2018-03-08

注:因篇幅有限,内容有所删减,具体详见链接:

http://www.cssn.cn/dzyx/dzyx_xyzs/201803/t20180308_3869902.shtml

学术前沿

一、智库报告

1、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研究报告(2018)

【作者】梁昊光 计金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家一带一路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英文标题】ANNUAL REPORT ON INVESTMENT SECURITY OF CHINA'S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2018)

【观点摘要】“一带一路”是我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我国发起的、与世界共同搭建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发展合作平台。2017年,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从蒙内铁路正式通车,到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从“冰上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到中老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迎来高光之年,成为国际重要热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合作硕果累累,顶层设计和规划持续细化,理念不断升华,朋友圈持续扩大。

2013~2018年的5年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治理重要议题的新方案新举措,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的现状与重要战略问题,科学评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风险,是国家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研究领域。

从新时代“一带一路”地缘经济趋势来看,主导世界空间格局演变的因素已由地理环境、地缘政治逐步过渡到地缘经济,国家间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也由原来的军事安全转变为经济发展。《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研究报告(2018)》从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角度出发,对于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影响因素,构建了包含投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四大指标在内的模型,以“一带一路投资安全指数”发布“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整体状况,为中航工业、招商局集团、中国电建、中国五矿等企业降低境外投资风险、提高境外投资成功率提供理论指导。

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投资安全指数差别较大,新加坡、波兰、捷克共和国、保加利亚、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印度处于“优先层级”;拉脱维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塞尔维亚、阿联酋、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阿尔巴尼亚、泰国、土耳其、卡塔尔处于“推进层级”;俄罗斯、克罗地亚、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匈牙利、波黑、科威特、孟加拉国、阿曼、蒙古国、缅甸、约旦处于“安全层级”;巴林、越南、马其顿、阿塞拜疆、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黎巴嫩处于“谨慎层级”;伊拉克、也门处于“关注层级”。在推进资金融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过程中,中低收入国家将是接受相关基金、银行等的金融信贷的主要国家,也是我国优势产能输出的主要目的地。

数据显示,与中国双边贸易额维持持续增长的相关国家有越南、伊拉克、巴基斯坦、泰国、孟加拉国、黎巴嫩、埃及、菲律宾、印度、柬埔寨、以色列、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约旦、马尔代夫、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叙利亚、东帝汶、亚美尼亚、捷克、塞尔维亚、不丹等国,受全球经济外部性影响,加强与沿线各国贸易的合作深度与合作力度有着较大的空间。

报告认为,在与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出口中,涉及的产业非常广泛,中国在几乎所有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有优势,也能为中低收入国家带去技术和资金,推动相关国家的经

济腾飞。在产能合作方面,双边经贸维持增长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中高收入经济体、经济体量较大的中低收入经济体以及少数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目前的总体产业技术水平和要素比较优势大致与中东欧发达经济体相似,产业内贸易增速明显。中国在与中东欧发达经济体、海湾发达经济体、新西兰、以色列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合作中,需要综合考虑区域经济产业需求与国家特色。

报告建议,“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必须始终重视对相关国家的持续关注,例如未来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后的西亚发展,北非相关国家的重建进程以及发展进程,并深入开展合作,通过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引导地区间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进而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潮流,取代军事霸权,构筑世界经济安全网络,并以此塑造国际分工新格局,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

详见链接: http://tt.cssn.cn/zk/zk_zkgb/201804/t20180427_4216618.shtml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4-27

2、“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8)

【作者】李永全,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ANNUAL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2018)

【观点摘要】《“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8)》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编写,为“一带一路”蓝皮书系列第三本。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8)》分为总报告、国际合作篇、国内区域篇、专题篇四部分。总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其中包含的合作理念正在被广泛接受,“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国际合作篇重点分析了中国与乌克兰、斯里兰卡、亚美尼亚、阿联酋、缅甸等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合作。国内区域篇研究了天津市、青海省、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专题篇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创新科技、矿产资源、旅游开发、教育人文等合作领域的问题与前景。

本研究报告突出权威性、原创性和时效性,具有相当的研究水平和参阅价值。

详见链接: http://tt.cssn.cn/zk/zk_zkgb/201804/t20180427_4216618.shtml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4-25

二、经贸金融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新比较优势——公共安全的视角

【作者】李兵,颜晓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安定和平是经济发展与贸易繁荣的基石,然而日渐蔓延全球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本文使用1984—2014年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和全球恐怖袭击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别考察了恐怖袭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恐怖袭击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进口;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恐怖袭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小,这一效果不仅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强国比较非常明显,而且也比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略微明显;这一效果在

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前并不明显,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更为明显。这一方面表明我国从事外经贸实务人员的勤劳勇敢、不惧死伤、勇于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使得我们更少遭到恐怖袭击的侵害,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新比较优势。但是,这种比较优势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和欧洲的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中不存在,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中,中国反而有比较劣势。本文的发现支持了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关键词】恐怖袭击;贸易;“一带一路”

【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01期

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多维距离影响研究

【作者】吉生保,李书慧,马淑娟(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徐州工程学院)

【摘要】文章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全面考察了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首先,本文直观给出了中国与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发现相比中日、中美“距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明显较近(中日之间地理距离除外),不同的距离维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有不同影响;其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距离色彩明显,“由近及远”态势初显;再次,借鉴引力模型,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面板数据,发现除地理距离以外,文化距离也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而经济距离的促进性和制度距离的抑制性则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具有稳健性。

【关键词】“一带一路”;OFDI;多维距离;引力模型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01期

3、区域经济空间相关性的趋势分析及影响因素

【作者】吴军,魏安喜(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摘要】以1978-2013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借助空间全局Moran's I、局部LISA与B-N分解模型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空间相关性的特征演变、根源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主要来源于确定性趋势;各行政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力,少数省份对周围区域具有正向影响;众多因素影响区域经济的空间相关性,整体上,加强区域之间的资金流动、技术流动和信息流动,加大中央财政支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努力缩小各地区对外开放落差与贫富差距,能有效促进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理运用区域经济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特别是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布局,能事半功倍地有效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空间效应;B-N分解;一带一路

【来源】《经济经纬》2018年第01期

4、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对接“一带一路”的途径分析——基于目标市场选择的视角

【作者】朱瑞庭(上海建桥学院)

【摘要】海外目标市场选择是零售业国际化的重要战略决策。基于零售业海外目标市场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一带一路”以“五通”为主要合作内容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目标市场。这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逻辑起点。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空间选择和市场机遇,加快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步伐,另一方面通过零售业“走出去”,来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从而充实和丰富“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内涵。

【关键词】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一带一路;目标市场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11期

5、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创新网络的协同性及发展机制

【作者】隋钰冰,孙永苑(深圳大学,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区域创新网络联系起来展开研究分析,根据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认为区域创新网络建设的动力来源于优化要素配置、产业升级及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区域创新网络的重点在于结点创新的学习与合作机制。而“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实现需要区域创新网络机制、产业集群关系链的创新机制及产业领导跟随机制给予支撑。因此,需要在提升结点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网络协同创新、增强企业合作等几个具体方面增强区域创新网络构建,为“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实现增添动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创新网络;动力;机制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11期

6、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环境风险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为例

【作者】丁志(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以“一带一路”沿线的26个国家为样本,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环境风险类型以及风险大小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环境风险因子分别为政治因子、经济和金融因子以及两国关系因子。新加坡、越南、蒙古等国的投资风险比较小,俄罗斯、伊朗、埃及等国的投资风险比较大。最后,建议企业应当规避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改善两国友好关系来降低海外投资的宏观环境风险。

【关键词】海外投资;宏观环境风险;“一带一路”;因子分析;

【来源】《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01期

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作者】刘薇,李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林业出版社)

【摘要】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配置型四种类型,并利用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不同类型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能促进出口,其中,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效应,市场寻求型和战略配置型出口创造效应相对较小。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资源丰富、具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同时积极开展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加强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

【来源】《价格月刊》2018年第01期

8、“人民币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动态联动研究——基于 VAR-DCC-MVGARCH-BEKK 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者】蔡彤娟，林润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摘要】以人民币汇率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动态联动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 VAR-DCC-MVGARCH-BEKK 模型检验了人民币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动态相关性、波动溢出效应与联动持续性。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所选取国家具有一定的区域辐射性：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正的时变相关性、一定的联动持续性，但是这些辐射能力并不强，表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内的接受、认可程度仍然不够。应继续开展和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提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认可程度；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离岸市场、海外债券市场建设，时机成熟时建立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加快境外开发区的离岸人民币业务试点和推广。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汇率联动；VAR-DCC-MVGARCH-BEKK 模型

【来源】《国际金融研究》2018 年第 02 期

9、区块链技术在“一带一路”区域物流领域的应用

【作者】王娟娟，刘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经济合作使“一带一路”区域物流服务的供求缺口日益扩大，为缓解这一矛盾，对区块链技术在这一领域的适用性进行探索性研究。从组件视角看，“一带一路”区域的物流主体和物流需求现状使区块链技术具有理论层面的适用性。立足每一组件的应用方案，借助仿真模拟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验证区块链技术在实践层面的可应用性，结果显示，这一技术有助于“一带一路”区域提升物流服务的透明度和构建高效的物流机制，但会降低物流过程的安全水平，融入权重因素后，整体上区块链技术在“一带一路”区域物流领域能够产生正效应，但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差距。综合考虑需求品质演进的不可逆性和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有限性，在“一带一路”区域的物流领域，只有以政府主导完成物流安全机制建设、引导破解“不可能三角”的技术研发为前提应用区块链技术，才能确保正效应的充分发挥。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一带一路”；物流；去中心化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18 年第 02 期

10、政治稳定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分析

【作者】刘敏，刘清杰，刘倩(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

【摘要】文章根据“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在 1996-2015 年间的数 据，采用动态门槛面板模型检验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其一，总体来看，政治稳定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二，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不同经济区间下政治稳定差异化的经济影响；其三，政治稳定的经济效应具有三个门槛值，人均 GDP 低于 2 807 美元为第一和第二门槛区间，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高于 2 807 美元的第三和第四门槛区间国家，政治稳定性显著地刺激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到此门槛，说明政治稳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正在日益显著。可见，“一带一路”推进下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利用双边或多边合作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释放政治稳定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门槛值；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动态门槛面板模型

【来源】《华东经济管理》2018年05期

三、政治法律

1、西方质疑“一带一路”的三维分析：心理·利益·体系

【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欧盟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

【摘要】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质疑既呈现无知与偏见，也有利益驱使、趋势担忧，反映出西方不习惯、不甘心中国领导世界，不认可、不看好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推广。概括起来，有三大质疑：一是对世界的质疑：未来几十年世界面临不确定性，质疑是对自身不确定性的转移。二是对中国的质疑：1)意图质疑：过剩产能倾销？中国改写国际规则？2)套路质疑：中国把国内那套带到国外？3)能力质疑：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国外能否推广？4)结果质疑：中国主导？中国中心秩序？三是对“一带一路”本身的质疑，包括：1)性质质疑：“一带一路”是公共产品还是中国战略？2)路径质疑：开放透明？规则导向还是发展导向？能否坚持公平竞争？3)方式质疑：“一带一路”如何融资？能否坚持高标准，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与现有机制什么关系？4)效应质疑：如何评估“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效应？如何处理地区领土争端？一国一策会否导致歧视性安排？5)有效性质疑：“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克服种种风险？6)后果质疑：“一带一路”是否制造债务危机？如何事先评估？本文从心理、利益、体系三个维度对此做了一一剖析，并提出了应对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西方；心理；体系；利益

【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第01期

2、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新近演化——以二十国集团和“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

【作者】沈伟(山东大学法学院)

【摘要】本文以权力博弈-规则制定为研究框架，以二十国集团为切入点，分析了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演化。作为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平台，二十国集团的经济治理对策和措施制定过程呈现出内生的紧张态势，在兼顾不同经济体需求的同时，有分化、对立和博弈的痕迹。作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规则制定的议事会议，二十国集团在涉及全球宏观经济重要方面的危机应对、规则制定和政策出台凸显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力量和势力的竞逐和拉锯，显示了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困境。逆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议题，受到了主要国家力量对比以及特定时空环境下国际体系总体特征的约束。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作用和在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可以在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法)的框架中得到深度的认知，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二十国集团的演进历程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中得到延展性的诠释。

【关键词】G20；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经济秩序；“一带一路”倡议

【来源】《当代法学》2018年01期

3、“一带一路”视角下法治服务体系的优化——基于法律价值理念的分析

【作者】汪习根，李曦光(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法学院吉林

大学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法治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根本保障,而沿线国家在法律制度、法系传统、法律文化上的重大差异甚至冲突,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诸多挑战。为此,要进行法治服务机制创新,首先必须升级法律价值、形成法理共识,探索实现市场自由、公平与安全三者互动的价值整合机制,在根本上实现从西方大国崛起初期奉行的“殖民法”到现阶段的“和平法”再到基于全球正义和共享主义的“发展法”的历史性飞跃。在规范上走出重国际法轻国别法、重中国法轻东道国法、重国际解纷机制而轻多边机制重构的三大误区,从国别的官方法和地方习惯法两个层面提升法治服务能力、优化法治服务体系;在国内构建和实施法律共享联席会议机制、国别法律能力提升机制,并与各国共同创设共商的法律服务机制、共建的制度供给机制、共享的法治互惠机制;在模式上,构建国内、区域和国际三位一体的法治服务尤其是律师服务合作伙伴关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法治服务;法律价值;“殖民法”;“和平法”;“发展法”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

4、“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北极国际合作:逻辑与模式

【作者】崔白露,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中国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标志着中国北极政策的确立,它是中国在把握世界发展变化、顺应中国发展形势和回应国际社会呼吁的需要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形成的,北极是“一带一路”在地理上的自然延伸,北极国际合作则是拓宽“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北极国际合作的条件在于国家共同利益的形成,北极国际合作平台的构建,以及对责任共同和命运共同理念的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三者的形成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北极参与,需通过加强与北极国家以及北极利益攸关方政策对接、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下北极沿线设施联通与资金融通、推动北极经济领域合作和贸易畅通、促进北极文化科技交流和民心相通、提供“一带一路”北极合作新平台改善北极治理机制等方式,为实现北极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模式。

【关键词】北极;北极政策;“一带一路”;北极国际合作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

5、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

【作者】秦亚青,魏玲(外交学院)

【摘要】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居高不下,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进入新时代的“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这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有助于全球治理走出实践和理论困境,引领塑造新型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

【关键词】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02期

6、“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创新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角

【作者】廖丽(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摘要】在法治化的进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税务等难免会产生争端,如何妥善处理这些争端是事关“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法治化的关键。倘若“一带一路”选择既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可以以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ICSID投资仲裁机制为基础,辅以双边协定,灵活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一带一路”争端。倘若构建新的多元纠纷解决中心,则需要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以磋商、调解、仲裁和诉讼为主要争端解决方式,先行构建“一带一路”调解中心、商事仲裁中心和投资仲裁中心,逐步打造完善的“一带一路”多元纠纷解决中心。“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需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立足于原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创新性争端解决机制,并结合国内司法机制,形成预防与解决相结合,双边与多边联动,国际与国内互补的符合新时代国际法治要求的争端解决机制。

【关键词】“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模式构建;国际法治

【来源】《法学评论》2018年第02期

7、“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作者】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摘要】“一带一路”具有区域主义属性还是多边主义属性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不仅决定着“一带一路”的范围和治理结构,而且决定它的发展路径选择。因此,讨论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建设“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经济学意义上,作为一个大国提出的国际合作战略,“一带一路”需要以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服务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最终目标,但它的起步阶段应该是一种区域合作机制。这是由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也是贯彻正确义利观的必然要求。承认“一带一路”的区域属性并不否认它最终具有多边属性。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一带一路”呈现出发展导向型特征。因此,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一带一路”能够发挥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职能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关键词】“一带一路”;义利观;区域主义;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03期

8、“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对策

【作者】徐卫东,闫泓汀(吉林大学法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倡议的提出,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已经成为海外投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背景的不同,所引发的法律风险类型主要有法律政策变动风险、政治因素法律风险、环境保护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风险和劳工权益保障法律风险;面对这些法律风险我国企业也并非束手无策,本文从如何转变海外投资立法指导思想、健全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制度、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三方面入手,对海外投资法律风险进行化解,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关键词】“一带一路”;法律风险;海外投资;风险规避;跨文化交流;风险管理;海外投资立法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03期

海外视点

1.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Radar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long the routes of the historical Silk Road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beyond these plans to build highways, ports and telecoms networks, the initiative i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in some less expected areas.

Being geographically a long 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Silk Road, Latin America, at first, did not have an obvious role to play in the Belt and Road.

This changed last year when the Mainland described the region a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this green light, investment and trade is likely to increase.

As Le Xia, Chief Economist for Asia at BBVA, explained,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not new. Trade has boomed in the past decade, with Latin America exporting everything from oil and copper to soy beans to China.

“If we look at interdependency, it is not only that Latin America depends on China,” Xia said, “but also China to some degree depends on Latin America for commodities. So, this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has increased quite a lot in recent years.”

Policy Change

The shift in policy is still likely to have an impact.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targets to meet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so if they are looking for ways to boost their performance in areas like exports, they have an incentive to consider the regi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to Latin America, however, has lagged – it is much smaller than Japan’s total investment, for example.

“In the past China didn’t have a lot of FDI,” Xia said. “But gradually, investment has been picking up.” He expects that, in the near term, investment in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will grow, as well as in sectors including telecoms,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IT, electricity, mining and aviation.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y is already driving investment in certain industries.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as proposed a “3 x 3” model for boosting China-Latin America collaboration focusing on logistics, power and information.

Many of the deals that have hit the headlines have been huge agreements involving China’s state-owned companies – for example, State Grid’s acquisition of Brazilian power group CPFL Energia and Shandong Gold’s purchase of a 50% share in Barrick Gold’s Veladero mine in Argentina, one of the biggest gold mines in the world.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active in the region recently include HNA, Three Gorges and COFCO.

Smaller private firms may find more difficulties investing in Latin America, among other overseas markets, due to “some headwinds from the policy side,” Xia said, referring to the crackdown on capital outflow.

“There is some concern that small companies want to move their production outside of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moving money overseas. For the short or even medium term,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ese small enterprises will face a lot of pressure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an outright ban, and manufacturers with a legitimate reason to make investments will still be encouraged.

Hong Kong companies, meanwhile, may find an outlet for their skills in finance, legal and arbitration. Xia reports that this is happening already, as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ese SOEs use Hong Kong to finance their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s a part of China, Hong Kong is still the mo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oriented place so it’s easier for Hong Kong to play this super-connector role in the Belt and Road.”

Latin America, of course, is not a uniform market. Traditionally, some nations have had strong relations with the U.S while others leaned more towards Mainland China. But the 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 and his promises of more restrictive trade policies means that a change in attitude is in the air.

“Now, it seem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re starting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Xia said.

Bearing this out, a BBVA study has revealed a shift i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in the region. “We do find that Latin America countries now show more enthusiasm for Chinese investment. This is a very good sign. We can see it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PC Yu, Chairman of the Chamber’s China Committee, has also seen the term ‘Belt and Road’ attract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Latin America.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established more than 2,000 businesses in Latin America, and bilateral trade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2017 exceeded \$210 billion,” he said. “The region is becoming an integral part of joint efforts in develop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initiative and the development blueprints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ill help open a new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growth.”

He added that as China boosts trade with Latin America, it is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a robust infrastructure network that can efficiently ship goods from producing centers to export hubs along South America’s Pacific coast.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nd in the areas of agriculture,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flects the fact that China’s presence is quite important in South America.”

Yu also expects that the grow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Latin America will benefit Hong Ko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will assume an important role in areas such as finance and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and shipp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roject interfacing and dispute settlement.”

Challenges Ahead

Tracy Wut, Partner at Baker McKenzie, noted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investors may face in the region.

“A lot of these countries may not have a very strong legal regime to protect your rights when there is a dispute,” she said at a recent Chamber seminar.

Getting things done can also take a long time, she added. In Mexico, for example, a merger is not legally effective until it is registered with the public register, which can take two months.

But sometimes, a problem can turn out to be not quite as bad as it initially seemed. Understanding the key issues and whether they actually impact your deal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he said.

“We cannot emphasize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due diligence – not just paper, but the need for face-to-face meetings and Q&A session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corruption in the region may also be of concern to investors. But, as

Wut pointed out, this volatility has also presented opportunities.

“The most recent wave of Chinese investment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a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that has swept Brazil,” she explained.

Known as Operation Car Wash, the probe has uncovered a web of corruption linking top politicians, state-owned firms and private contractors. It has bankrupted several companies and forced others to divest assets.

“This last,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driver of a lot of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suddenly, everything is for sale, from ports and highways to airports and railways.”

Green Opportunities

Another way companies can find less obvious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o use their specific and world-class industry knowledge. And green technology is one area where Hong Kong companies have got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Steve Wong, Managing Director of energy consultancy BillionGroup Technologies, noted that sustainability is a priority of many Belt and Road projects. This is a change from when the Mainland started to open up.

“China in the last 40 years has been successful in lifting people out of poverty,” Wong sai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generated a lo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Lessons have been learned and the Belt and Road will not continue with this polluting model. “That is why we must talk about a green One Belt One Road – and about ecolog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ju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demand for green development is also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legal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to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these cross-border deals. Wong also pointed out that Hong Kong’s role as a hub means that local companies are well-placed to call on the necessary global talent.

An engineer by training, Wong set up BillionGroup in 1991 as a building consultancy, changing focus to the energy sector in 2000. Wong admitted that this switch was a little bit “too early,” but now the group has found a market for its specialized skills across the globe in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Indonesia, and Bangladesh.

BillionGroup focuses on energy, waste management and infrastructure – all of which are in strong deman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company’s success in winning contracts is an example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es with specific expertise.

For Hong Kong companies seeking to get involved in Belt and Road projects, Wong advised that they need to offer services “to the top level, to even above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e have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To successfully bid for these contracts, Wong said: “You have to be the number one leader in your niche market, not the second.”

【 Source 】 (2018.5.29) by Helen Sloan(Editor of The Bulletin, HKGCC).
<http://www.chamber.org.hk/en/index.aspx>

2. Tapping Kazakhstan’s Growth Potential

Kazakhstan is expecting a minimum of US\$5 billion (RM19.9 billion) worth of investments

from Malaysia, according to it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Kairat Abdrakhmanov, who said green projects have been gaining traction from Malaysian investors.

Kazakhstan has been working on improving its investing climate and Abdrakhmanov stressed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Our economy is growing and there is huge potential,”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Edge Financial Daily at the 15th Eurasian Media Forum in Almaty, Kazakhstan last week. He noted that the trade turnover between Kazakhstan and Malaysia amounted to US\$123.4 million in 2017, while direct investments from Malaysia to Kazakhstan stood at US\$21 million.

On the whole, Kazakhstan has attracted US\$200 billion of investments, with half of the investment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st from the US, UK, China,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Kazakh Invest website, agreements have been reached with 42 new foreign investors for projects amounting to US\$7.5 bill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f the projects, 18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works worth US\$1 billion have commenced, while four projects with major foreign investors have been signed. There is “active development” in the 15 projects worth US\$7.1 billion.

Given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Kazakhstan and Malaysia since the mid-90s, Abdrakhmanov said both countries have reached a very high level of interaction in politics, economics,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culture.

Known for its oil and gas industry, Abdrakhmanov said Kazakhstan is now making an attempt to diversify its economy to ensure that while oil and mining remain attractive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s) there is also diversification into other sectors. “Malaysia is serving for us as the best example on how to manage ... and not only to attract FDIs but to make sure that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is sustainable and bringing in some very concrete results as Malaysia is now very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economics scene.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very amazed by how Asean itself is growing today. For us, it is an example, how regional integration could evolve. So, now we are inviting Malaysian investors in sectors such as machinery building, food processing, agriculture, telecommunications, IT, defence-related industries, and textiles.”

In additio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drakhmanov sees more connectivity not onl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with Southeast Asia. Notwithstanding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in Malaysia, Abdrakhmanov does not see any uncertainty, challenges or problems in terms of investments and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spite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leadership,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heavily in our friendly bilateral relations. We are open and we see huge potentia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urce】(2018.5.28) by Wong Ee Lin. The Edge Financial Daily.<http://www.theedgemarkets.com>

3. Mexican ‘Silk Road’ Trade Corridor is Set to Spice up US Tension

In the crook of Mexico’s elbow lies the Isthmus of Tehuantepec, the country’s skinniest strip of land, where the Atlantic and Pacific are just 200km apart. Winds from the west power electricity-generating turbines, the lush soil supports lemon, mango and other crops, and it is the heart of a vibrant indigenous Zapotec culture. The brightly coloured embroidered blouses and skirts,

immortalised by Frida Kahlo, are still daily attire.

But it is also home to some of Mexico's poorest communities. A powerful earthquake in 2017 caused devastation only four years after a hurricane pummelled the isthmus simultaneously from both shores.

Now,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the frontrunner in Mexico's July 1 election, has his sights set on the gateway to Mexico's deep south. He wants to revitalise a rail corridor across the isthmus that could act as a Panama Canal-lite, opening up a short-cut to the Atlantic.

The plan is by no means new: talk of reactivating a trade corridor here has swirled for decades. But Gerardo Esquivel, a Harvard-trained economist and development expert, who is one of Mr López Obrador's economic advisers, sees China as a natural fit to make it happen.

China is investing in “new Silk Road” trade corridors spanning 65 countries under it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well as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beyond its traditional focus on raw materials.

“I can see us perfectly well approaching the Chinese, above all. It's the type of project they will certainly want to invest in, because they are long-term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ith clearly positive returns,” Mr Esquivel says.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cost \$7bn in the first year alone and to require a combin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funding.

He portrays the corridor as an emblematic project, not only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allow cargo to avoid the Panama Canal, more than 2,000km to the south, but also giving businesses a reason to locate to Mexico's depressed south.

From 2014-16, Mexico netted more than 40 Chinese investment deals valued at more than \$4bn, according to an Atlantic Council study. The think-tank called that “a remarkable amount considering no previous year had seen more than five deals”.

There is one snag: China has a less than happy history of investing in Mexican infrastructure. Beijing tried to champion another big project four years ago — a high-speed rail link to connect Mexico City and the city of Querétaro. President Enrique Peña Nieto was forced to scrap a contract awarded to a consortium led by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 — an embarrassing two days before a visit to Beijing — after an outcry over transparency. It then emerged that the president's White House family mansion had been paid for by a contractor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led train consortium.

That is just the kind of murky, crony corruption scandal that “Amlo”, as Mr López Obrador is widely known, is crusading to eradicate. He is streets ahead of his rivals with 48 per cent support, according to a poll of polls. Ricardo Anaya, at the helm of a right-left coalition, has 28 per cent and the ruling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s candidate, José Antonio Meade, has only 21 per cent.

A southerner himself, from the state of Tabasco on the Atlantic side, Mr López Obrador will want to announce the Trans-Isthmus Corridor “on the first day of his government”, Mr Esquivel says. He suggests that Carlos Slim, the telecoms mogul with big infrastructure interests, might also be keen; he partnered with Mr López Obrador on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historic city centre during Amlo's five-year tenure as mayor of Mexico City.

However, Marcelo Ebrard, who is spearheading Mr López Obrador's campaign in northern Mexico, says he expects US investors to be the most interested: “It makes more sense. The US is our main partner,” he says.

Whoever invests, Amlo, a history buff, can take heart from a report by W Max Miller, secretary to His Majesty's Legation at Mexico in 1907, on prospects for the original British-built

railway. “It is always dangerous to prophesy,” he wrote, “but if pluck and perseverance are to have their reward, certainly the Mexican Isthmus route should be a success.”

【Source】(2018.6.6) By Jude Webber.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opinion>

4. Silk Road Revival Needs to Protect People and Environment

IMF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s cautionary words (April 13) on the debt burden likely to be borne by the 70 countries destined to be par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to be welcomed. Beijing has proposed major “Silk Roa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s linking China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There is another issue, however, that has attracted insufficient comment and analysis; this relates to the potentially immens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s. What is to happen to the possibl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ulturally diverse and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people and communities who may stand in the way of these developments or become impoverished by them?

Furthermore, most of the target countries in the (now name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ill have made commitments to global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These are design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se, and protection when necessa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at provide the underpinning of all economies. There are longstanding globally endorsed agreements relating to, for example, the safeguarding of freshwater systems and associated animal and plant species; migratory animals, thereby benefiting millions of seasonally migrating birds, whales and dolphins; as well as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o which there are now nearly 200 country parties.

Recognis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 for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projects should only receive investment if they can demonstrate they will provid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ll the people of these countries.

In addition, investments should only be made that lead both to the improved status of life-supporting ecosystems and the global survival prospects for thousands of wild animal and plant species currently suffering severe population declines.

【Source】(2018.4.19) By Janet Barber (Cheltenham, Gloucestershire, UK).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

5. EU Warns UK-centred China Import Scam may Shift to Europe’s “Silk Road”

European Union anti-fraud investigators suspect Greece and Hungary may have become the main EU centres of a multi-million-euro scam involving imports of Chinese clothing and footwear that uses the infrastructure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The large-scale fraud, which involves underdeclaring the value of imported goods to pay lower duties and sales taxes, was first uncovered in Britain, where it had gone on for years, promptin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is year to demand that London pay 2.7 billion euros (\$3.1 billion) in lost customs duties to the EU budget.

Officials at the EU anti-fraud agency OLAF said they now suspected the scam could have shifted to Hungary and to the port of Piraeus in Athens, which has been majority-owned by China's state-owned COSCO Shipping since 2016.

Hungarian and Greek customs data show a surge of undervalued clothing and footwear imports from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OLAF officials told Reuters. They stressed that this trend had coincided with a drop in undervalued Chinese imports into Britain.

Customs duties in EU countries are a direct revenue for the bloc's budget. They are collected by national authorities before being sent to Brussels.

“We are worried about this,” OLAF's director for investigations Ernesto Bianchi told a news conference in Brussels on Wednesday, adding that monitoring of import flows would be enhanced.

Reuters exclusively reported in April that Italian authorities were investigating suspected import fraud by Chinese criminal gangs at Piraeus port, the largest in Greece. .

Asked about the suspected fraud in April, COSCO Shipping said: “The company has in its global operations consistently and strictly followed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laws, and persevered to operate legally and compliantly.”

Hungarian and Greek customs authorities were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for comment.

China wants to transform the Greek port into its “gateway to Europe” as part of its \$126 bill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envisions a new Silk Road of land and sea routes with trading partners.

Under the plan, a fast rail and land route would connect Athens to the Hungarian capital, Budapest, across the Balkans. That same route could have been used by traffickers to move underpriced and undeclared Chinese goods to Hungary, investigators suspect.

“It is maybe too soon to jump to conclusions, but it is worrying that fraudsters are now obviously looking a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s a business opportunity for them too,” Bianchi said, urging EU authorit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infrastructure built by the Chinese “is not exploited for illicit traffic”.

In the British scheme, Chinese criminal organisations used the German port of Hamburg as Europe's first arrival point for undervalued clothing and footwear cargos. But goods passed customs controls only after having been shipped to Britain's ports, under EU rules that spare checks on items in transit between the bloc's member states.

The British ports of Dover and Felixstowe were still the EU's main hubs for undervalued Chinese imports in 2017, OLAF data showed, but that flow has nearly stopped this year because of stricter checks by British customs, EU officials said.

Britain's decision to leave the EU's customs union might have also persuaded the criminal groups that oversee this business to find new routes to bring Chinese goods into Europe, the officials sai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contesting that frauds occurred in UK ports. OLAF chief Nick Ilett said he expected the controversy with Britain would last “some time” and would probably need to be settled at the EU's court of justice.

OLAF defines undervalued goods as those which fall far below the average price declared in all EU customs.

【Source】(2018.6.6) By Francesco Guarascio. Reuters. <http://www.dailymail.co.uk>

他山之石

1. Energy Investment Risk Assessment for Nations Alo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Author】Duan, Fei ; Ji, Qiang ; Liu, Bing-Yue ; Fan, Ying

【Abstract】Overseas energy investment as an effective way of securing energy supply is being favored by the world's leading energy consuming countries. However, energy investment has the potential high risk on multiple forms, including political and regulatory risk, currency, liquidity and refinancing risk as well as resource risk and so on. To effectively evaluate overseas energy investment risk, this study proposed a new indicator system from six dimensions. Furthermore, a fuzzy integrated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entropy weight was constructed to rate the energy investment risk for 50 nations alo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source potential and Chinese factors have become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energy investment risk, whil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al risk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for investing decisions. In conclusion, Saudi Arabia, United Arab Emirates, Pakistan, Kazakhstan, and Russia are the most ideal choices for China's energy investment balancing resource potential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Energy investment assessment; Belt & Road Initiative; Entropy weight

【Source】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170. Jan2018, Issue 1, pp.535-547.

2. Do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Chinese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Source】Du, Julan ; Zhang, Zhang, Yifei

【Abstract】In response to the One Belt One Road (OBOR) initiative,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 especially whole or majority-ownership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ose significantly in the belt-road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ones along the continental route. Comparatively speaking, China's state-controlled acquirer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s, whereas the non state-controlled acquirers were particularly active in non-infrastructure sectors. Central and West Asia, We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re favorable destinations of Chinese ODI.

【Key words】One Belt One Roa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Greenfield investment

【Source】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7. Feb2018. Pp.189-205.

3. Enhancing Eco-Efficiency of Agro-Products'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 System Dynamics Approach

【Author】Zhao, Rui; Liu, Yiyun; Zhang, Zhenyan ; Guo, Sidai ; Tseng, Ming-Lang ; Wu, Kuo-Jui

【Abstract】This study redesigns the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outhwest Chin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improve its eco-efficiency by considering the associated agro-wastes flowing into bioenergy enterprise for energy production. Two scenarios are created, in which the first assumes that all waste flows into the enterprise, whereas the second only considers the inflow of agro-waste produced by farmers and the wholesale market. A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is conducted by using carbon emissions per product as an indicator to obtain the optimal scenario for managerial practice and design an incentivizing mechanism to drive supply chain operations. A case study is provided to demonstrat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dynamics. Finall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re discusse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Key words】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co-efficiency; Closed-loop; System dynamics; Agro-products

【Source】Sustainability. Volume 10, Mar 2018, Issue 3, pp.1-15.

4.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act on Shipping Law in China

【Author】Yu, Yaodong; Chang, Yen-Chiang

【Abstract】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is currently governed by a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he 2008 Rotterdam Rules represen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most recent effort to harmonise and modernise the rule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of carriage in an era of new commercial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Nevertheless, most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in Asia, have adopted a, “wait and see” attitude. Upon examination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hipping law in China,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while widespread ratification of the Rotterdam Rules is unlikely in the near future, harmonisation of shipping laws, through incorporat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to domestic laws, is possible. China, as the proposer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ay be considered as a leading country in this endeavour.

【Source】Marine Policy. Vol. 87, Jan.2018, pp.291-294.

5. Does Finance Affec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Evidence from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Region?

【Author】Hafeez, Muhammad ; Chunhui, Yuan ; Strohmaier, David ; Ahmed, Manzoor ; Jie, Liu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finance 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investigate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of each country among 52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OBORI) using the latest long panel data span (1980-2016). We utilized panel long run econometric models (fully modified ordinary least square and dynamic ordinary least square) to explore the long-run estimates in full panel and country level. Moreover, the Dumitrescu and Hurlin (2012) causality test i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short-run causalities among our considered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validate the EKC hypothesis; the long-run estimates point out that financ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negatively in few cases). The short-run heterogeneous causality confirms the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finance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empirical outcomes suggest that policymakers should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ssue caused by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egion.

【Key words】Financ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OBORI);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Dynamic ordinary least square (DOLS); Fully modified ordinary least square (FMOLS); Heterogeneous causality

【Source】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25, Issue 10, pp.9579-9592.

6.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reliminary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Author】Zhai, Fan

【Abstract】Using a global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ccounting for the externalitie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respect to trade cost reduc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the analysis finds BRI would bring sizable benefits to the world economy in terms of welfare and trade, even under conservative assumptions about the size of total investment under the initiative. However, China and other BRI countries need to address several important challeng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initiative with success and realize these benefits.

【Key words】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Source】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Apr.2018, Vol. 55 Issue 3, pp.84-92.

7. Will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uthor】Nordin, Astrid H. M.; Weissmann, Mikael

【Abstract】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leadership,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have moved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a more assertive bid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that is beginning to take form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is initiative focuses on connectivity in policy coordination, facilities, trade, finance and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in order to connect China to key parts of Asia, the south Pacific, east Africa and Europe. Networked capitalism and the national unit, which are often seen as spatial opposite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re both exercised through the BRI in mutually supporting ways. Networked capitalism is not challenging the national spatial unit, nor vice versa. Rather, they conglomerate to reinforce Chinese government narratives which portray China as the new trailblazer of global capitalism-thus illustrating and justifying a new Sinocentric order in east Asia. Likely winners of this constellation, if it is successful, are megalopolises in Eurasia, and most of a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kely losers ar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BRI, most notably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ontext wher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signalling a more protectionist st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drawing from free trade pacts like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ump may ironically enable Xi's dream of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

【Key words】Soft Power; Silk Road; Dream

【Source】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Mar.2018, pp.231-249.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
The Academ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地址：中国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1900 号乐群楼 213 室

邮编：201620

电话：021-67702013

传真：021-67702013

网址：<http://www.suibe.edu.cn/ecbr/>

电子邮箱：etrcbr@suibe.edu.cn